

黄侃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

卢 烈 红

黄侃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其中以在训诂学方面的贡献为最大,而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深的又是语源学的研究。语源研究是训诂学的高层次课题,它有助于展现语言的系统性,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黄侃对语源研究特别重视,他认为训诂学的核心是“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①。他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语源学理论体系,同时以《说文》《尔雅》为依托,进行了大量的语源研究实践。他对语源学的贡献是他训诂学成就中最富光彩的部分。下面试从四个方面谈谈他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内容。

一、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同源词产生的途径

章太炎著《文始》,“其书中要例,惟变易、孳乳二条。”^②黄侃上承师说,对“变易”、“孳乳”两大条例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充分的发挥,以之说明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揭示同源词产生的途径。

黄侃在很多地方论述过“变易”和“孳乳”,这些论述是互相补充的,要正确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术语各自的内涵,必须将各处的论述综合起来考察,执于某一处的说法,往往会产生误解。下面对两个术语分别加以考察。

先看“孳乳”

黄侃在《与人论治小学书》中指出:“孳乳者,声通而形、义小变。……试为取譬……孳乳,譬之一声数字。”^③据这里“一声数字”的说法,似乎他认为孳乳之字(词)与其源词的声音关系只音同一种类型,其实不然。他在《说文略说》中,将孳乳分成三类,这三类是:“一曰,所孳之字,声与本字同,或形由本字得,一见而可识者也;二曰,所孳之字,虽声形皆变,然由训诂展转寻求,尚可得其径路者也;三曰,后出诸文,必为孳乳,然其词言之抵,难于寻求者也。”^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孳乳之字(词)与其源词的声音关系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声音相同,一类是声音有变转。黄侃又说:“孳乳者,语相因而义稍变也。”^⑤“故观念既改,界说亦异者,文字之孳乳也。……孳乳性为分裂也。”^⑥“孳乳者,譬之生子,血脉相连,而子不可谓之父。”^⑦“文字孳乳,大抵义有小变,为制一文。”^⑧

综合以上各处的论述可知,黄侃所谓的“孳乳”,其最本质的构成要素是意义有异,其运

动的方式是从源词“分裂”，分裂的结果在语音方面表现为音同或音转，在书面上表现为有了借以记录的新字。显而易见，黄侃所谓的“孳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词分化”，亦可名之为“分化造词”，它是同源词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在历时的链条上发生的同源派生运动。对这种运动，黄侃揭示了它的构成要素、运动方式、结果，论述是全面而精到的。

次看“变易”

黄侃说：“变易者，声、义全同而别作一字。”^⑧“变易者，形异而声、义俱通……试为取譬，变易，譬之一字重文。”^⑨观此数语，似乎“变易”仅指异体字。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黄侃说的“变易”包括异体字，但并不限于异体字。在《说文略说》中，他指出：“变易之例，约分为三：一曰，字形小变；二曰，字形大变，而犹知其为同；三曰，字形既变，或同声，或声转，然皆两字，骤视之不知为同。”^⑩这里所提到的“声转”，就再也不属于文字异体的性质。两个字只要声音不同，就是两个不同的词，而不是异体字。黄侃还说过：“变易者，意同而语异也。”^⑪“变易性为蜕化。”^⑫这里的“语异”“蜕化”两种提法也证明“变易”包括一词（语）转变为另一词（语）的情形，我们姑且称这种情形为“转化造词”。黄侃就他上面所谈到的变易第三型举过例字，这些例字更能证明他的“变易”不限于异体字。他说：“天之训为颠……然与天同语者，有囟，声稍变矣，由囟与天而有颠。此之造字，纯乎变易也。颠语转而有顶，有题，义又无大殊也。……是故囟、颠、顶、题，皆天之变易字也。”^⑬很明显，“天”“囟”“颠”“顶”“题”五字相互之间音有变转，它们不是异体字，而是由转化形成的不同的词。

由上可见，黄侃的“变易”确含有异体字和转化造词两大类，而这两大类之所以共有一总名，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以“意同”为基础，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故观念既同，界说亦同者，文字之变易也。”^⑭这“意同”、义界不变是“变易”区别于“孳乳”的最本质特征，或说是“变易”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异体字意义相同，声音不变，唯形体有异，只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因此与同源词无关。转化造词则不同。转化造词的起点我们可仍称其为源词，而由转化生出的新词我们不妨给予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它“转化词”，以这一名称与“派生词”分立，让“派生词”专指由旧词分化出的新词^⑮。源词和转化词虽然在后来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意义的差别，但其转化之初意义是相同的。这种以义同为基础的音转造词，其形成的词群显然是同源词，如上述黄先生所举的“天”“囟”“颠”“顶”“题”就是一组同源词。因此，转化造词与旧词分化一样，同为同源词产生的途径之一。

对转化造词的具体情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黄侃说：“上古疆域未恢，事业未繁，故其时语言亦少；其后幅员既长，谣俗亦杂，故多变易之言。”^⑯他又说：古人言语文字“随方俗时代而变易。”^⑰显然，在他心目中，转化造词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动而发生的，转化词是源词因时、空不同而产生的变体。事实的确如此。拿时间变动来说，随着社会的演进和语言自身的发展，某词的指称、意义未变，但它的语音发生了变化，书面上也出现了记录它的新字，这就标明旧词已经蜕变为新词。这种由旧词蜕化为新词的运动是历时的，纵向的。拿空间变动来说，通语中的某一个词，在方言里有另外的语音形式，但语音的变换合乎对应规律，书面上有记录这个方言词的字，那么，这个方言词与通语中的那个词就构成同源关系，是该词的地域转化物。这种由通语词转化出方言词的运动是共时的，横向的。对因空间变动亦即由方言不同而产生的转化造词今人多有论列，但对因时间变动而产生的转化造词今人很少注意到，黄侃发掘出了这后一种情况，这是很可贵的。

总之，黄侃以“孳乳”“变易”两大条例揭示了同源词产生的两大途径：以词义分化为基

础的分化造词,以词义不变为基础的转化造词。分化造词和转化造词中与时间变动相联系的那种情形是同源词的纵向滋生,转化造词中与空间变动相联系的那种情形是同源词的横向滋生。黄侃的分析,能使我们对同源词产生的途径获得深入的了解。

二、在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发掘出一系列与语源问题相关的具体原理

黄侃深入到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中,悉心探究,发掘出了一系列与语源问题相关的具体原理,今择要叙述如下:

1. 声符多兼义

黄侃指出:“凡形声字以声兼义者为正例,以声不兼义者为变例。”^⑨“《说文》字从何声,即从其义者,实居多数。”^⑩这两段话的意思都是说:声符多兼义。形声字声符兼表意义的问题,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由此有“右文说”的诞生。可惜“右文说”将声符兼义的现象绝对化,认为声符皆兼义,这就逸出真理的范围而滑向了谬误。黄侃批评了“右文说”的偏颇,他说:“宋人王子韶有右文之说,以为字从某声,即从其义,展转生说,其实难通。如知众水同居一渠,而来源各异,则其缪自解矣。故治音学者,当知声同而义各殊之理。”^⑪在他看来,声符是“多”兼义,而不是“皆”兼义。黄侃的这种认识和表述正确反映了语言实际。

黄侃还分析了人们造形声字的具体操作过程,藉以揭示声符多兼义现象的成因。他指出:“形声之字虽以取声为主,然所取之声必兼形、义方为正派。盖同音之字甚多,若不就义择取之,则何所适从也。右文之说,固有至理存焉。”^⑫这就是说,当人们造形声字的时候,选取声符决不会无所考虑,面对众多的同音字,必定会选用其中的义同或义近者。他的这种分析为声符多兼义原理找到了发生学上的坚强依据,使这一原理更加可信:既然造字时就是选用音同义同或音同义近的字作声符,那么造出的形声字,其声符就必然与整个形声字既同音,又有意义联系,因而兼有表义作用。

声符多兼义原理与语源研究关系至密,它既是用语源学眼光观察形声字所获得的发现,又是在形声字中考求同源词的理论依据:由于声符多兼义,所以声符字与由它构成的形声字多有源流滋生关系,同声符的形声字多为同源词。

2. 声符有假借

形声字的声符,有些直接兼有表义作用,有些虽然初看起来与整个字的意义无关,但若细加推究,就会发现它是某一个字的假借字,它所代表的那个本字既是整个字的标音成份,又是整个字的构义部件,因此它本身实际上间接地具有表义作用。这后一种现象就是声符假借。黄侃通过研究《说文》,对这种现象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凡形声字,无义可说,有可以假借说之者。”^⑬他分析了“禄”和“祠”两个字例,认为:“禄”从“录”无义,“录”当是“鹿”的假借字,“录与鹿同音。又古者以鹿为贄,则音与义皆合也”;“祠”,《说文》以“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释之,其声旁“司”实是“词”的假借字。不难看出,他“有可以假借说之者”的表述用的是一个特称判断,意为“声符有假借”,这种表述符合语言实际,因而是科学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提到,在《说文略说》中,他有一段与此不尽一致的表述:“是故形声之字,其偏旁之声,有义可言者,近于会意;即无义可言者,亦莫不由于假借。”^⑭这里用“莫不”二字作了一个全称判断,意为除了直接兼义的声符外,其它声符都是

假借。这种表述既背离语言实际，又与他自己“声符多兼义”之说相矛盾，因为如果真的象他这里所说的那样，那么，直接兼义的声符加上因假借而间接表义的声符就是声符的全部，因而也就是“声符皆兼义”了！两种表述哪一种代表他的真正看法，现在已无法考明，或许他本来就在这两种看法之间摇摆不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不成熟。但是不管怎样，藏在文字后面的声符假借的隐秘是章太炎、黄侃首先发现的，其功劳不可埋没。

声符有假借原理为语源研究昭示了一条特殊门径：拨开形体的迷雾，以声音为线索，破译出声符所代表的本字，找到整个形声字与这个本字的源流滋生关系。

3. 引申义可为义源

黄侃在分析形声字的声义关系时，列有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声之取义虽非其本义，而可以引申者”^⑤。他举例说：“禴，毁庙之主。从危。危，在高而惧也。危而可惧则易毁。”^⑥禴，数祭也。从毳。毳，兽细毛也。毛细则数矣。”^⑦他的意思是，在声符兼义的形声字当中，有些形声字不是取声符的本义，而是取声符的引申义来与意符会意，象“禴”字，它“毁庙之主”的意义就是取“危”的引申义“易毁”而形成的；“毳”字，它“数祭”的意义就是取“毳”的引申义“数”（多、密）而形成的。他这里的说法是文字学的说法，如果把这转换为语言学的说法，就是：形声字所代表的那个词，以声符所代表的那个词的引申义而不是本义作为自己的构义要素，声符所代表的那个词与形声字所代表的那个词有同源关系，声符所代表的那个词的引申义是形声字所代表的那个词的义源。黄侃在《与人论治小学书》中纯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过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更直接更明晰地表现了他的这种观点。如他分析“邇”“辛”两个字说：“邇之本义为过度之过”，其引申义是过失，“辛”之义是罪，由“邇”孳乳出“辛”，“此由邇之引申义孳乳”^⑧。很显然，他认为派生词“辛”是以源词“邇”的引申义为出发点孳乳出的，“邇”的引申义是“辛”的义源。

黄侃引申义可为义源这一发现十分可贵。当今学者普遍认为确定同源词必据各词的本义。其实，在语言中产生较早的那些词，很早就在本义之外发展出了引申义，因此，在语言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的本义可以成为新词滋生的出发点，它们的引申义同样可以成为新词滋生的出发点。黄侃的发现，能纠正当今学者的错误认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4. 相反同根

黄侃指出：“古语相反而同根者多，如多少、长短、治乱之类。”^⑨所谓“相反而同根”，是说有些词意义相反而语源相同。黄侃所举的例子虽然不一定可信，但他揭示的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语言中的词，有些本身含有两种反向的意义，有些因引申而出现反义^⑩，当语言表达的精确化要求迫使这些词发生分化时，分化出的表反义的词就有可能与原词构成同源词。

三、昭示了语源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黄侃就如何研究语源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其一，以声音贯串训诂，但又不将音义联系绝对化。黄侃特别强调语源研究要“以声音贯串训诂”^⑪，他认为：“推求文字之孳生统系以得其条理者，非音韵将何由乎？”^⑫“文字、训诂亦非以音韵为之贯串，为之钤键不可。”^⑬所谓“以声音贯串训诂”，就是说要以声音为线索，串联一系列音义相关的字词，确定它们的同源关系。他强调以声音为线索，源于他对语音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声音即训诂。”^⑭“音韵者，文字之咽喉也。”^⑮诚如所言，语言以

意义为内容,以声音为物质形式,声音是意义的载体,没有声音,也就没有语言;语言的发展演变以声音为依托、为表现,由孳乳变易而形成的一组组同源词,是以音同音近为它们血肉联系的物质表现形态的。因此,以声音为线索串联同源词符合语言自身的规律,对语源研究来说,它是甚为重要的原则和方法。

在强调以声音贯串训诂的同时,黄侃又提醒人们不要将音义联系绝对化。他说:“然则凡同音者必同义乎?按同音者虽有同义,而不可以言凡。淮南虱与瑟同音,周人谓玉为璞,郑人谓鼠为璞,此音同而不必义同也。”^⑧他对语音与语义关系的这种辩证看法,堪称真知灼见。

其二,既突破字形的束缚又尽量利用字形。一方面,黄侃力主突破形体的束缚。他认为:“以声音贯串训诂,而不拘执于形体,可以补二王之说。”^⑨这里的二王指王安石、王子韶。王安石的《字说》纯据形索义,王子韶“右文说”也拘执于字形,把考察的范围局限在声符相同的字之内,不知道形体无关的字也可以有音义联系。王安石的研究远没有进到语源研究的层面,“右文说”对同源关系的考察也还是用文字学而不是语言学的眼光。黄侃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与文字的分界,他曾说:“语言先于文字”^⑩,“文字基于言语,言语发乎声音。四书未造之时,未尝无此言语也。”^⑪他主张用语言学的眼光来考察同源词,超越文字形体,着眼于语言中的词,找出音义同源的词群,其中包括那些在书面上形体无关的、声符有假借的。另一方面,他并不忽视字形在语源研究中的作用。他指出:“小学必形、声、义三者同时相依,不可分离,举其一必有其二。清代小学家以声音、训诂打成一片,自王念孙始,外此则黄承吉。以文字、声音、训诂合而为一,自章太炎始。由章氏之说,文字、声韵始有系统条理之学。”^⑫在这段话里,他明确提出小学研究应结合字形,对忽视形体的清儒有所贬抑,推崇同时注意字形的章太炎先生。不难明白,他对字形的重视是与他“声符多兼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因为既然形声字声符大多兼表意义,同声符的形声字大多是同源词,那么形声字的声符就是寻求同源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应充分加以利用。

其三,源流并重,上下推求。黄侃指出:研究语源,“其推求之法,或由下推上;或由上推下。由下推上者,不能不有根;由上推下者,又不能不安根也。”^⑬“由下推上”是由滋生词溯其“根”,“由上推下”是由“根”而求其滋生词系统,由前者可“溯其源”,由后者可得其流,“见其统类”^⑭,前者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推源,后者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系源。语源研究确实应如他所说,展开这两方面的工作,溯源讨流,以探明语言的系统与条理。

四、以《说文》《尔雅》为依托,进行了大量的语源研究实践

黄侃既构筑了语源学的理论体系,又进行了大量的语源研究实践。他一生精研《说文》《尔雅》,在大徐本《说文》上加有识语数十万言,在郝懿行《尔雅义疏》上加有识语十余万言。黄焯先生据大徐本《说文》上的识语编有《说文同文》(收在《说文笺识四种》一书中),据《尔雅》郝疏上的识语编有《尔雅音训》。《说文同文》涉及《说文》中近四千个字,它系联的同源词数量可观,《尔雅音训》在寻求语族共同遵循的声韵规律的同时,也系联了大量同源词。另外,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推源系源的例子也不少。现从《说文同文》和《笔记》中举出三例,以见黄侃语源研究实践之梗概。

《说文同文》:“幽同杳、窅、𡩂、窈、窵。”^⑮案,“幽”影母幽韵,《说文》释为“隐也”;“杳”影母宵韵,《说文》释为“冥也”;“窅”影母宵韵,《说文》释为“冥也”;“𡩂”影母宵

韵，《说文》释为“望远合也”；“窵”影母宵韵，《广韵》释为“隐暗处”；“窵”影母幽韵，《说文》释为“深远也”。这六个字意义相通，声母相同，韵部或同或有旁转关系，实为一组同源词。六个字在形体上没有统一的构成部件，黄侃将它们系联在一起，突破了形体的局限。

《说文同文》：“愤同懣，闷。又同忿。”^⑨案，“愤”並母文韵，《说文》释为“懣也”；“懣”明母元韵，《广韵》释为“烦闷”；“闷”明母文韵，《说文》释为“懣也”；“忿”滂母文韵，《玉篇》释为“恨也，怒也”。这四个字义近，声母或同或为旁纽，韵部或同或有旁转关系，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也把它们作为同源词系联在一起。

《笔记》“虻血不与虫名虻蜉同，盖以花似虻蜉翼得名。”^⑩这一条是就《尔雅·释草》“苳，虻血不”所发的议论。黄侃认为草中的“虻血不”得名于虫中的“虻蜉”，虽然我们今天对二名孰先孰后的问题还不敢下结论，但“血不”与“蜉”滂並旁纽，之幽旁转，“虻血不”与“虻蜉”有同源关系是无疑的。由此条可知，黄侃研究语源，有关于双音词者。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黄侃语源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和实践成果，显而易见，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语源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也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除上面论述中附带提及的外，主要的有两点：第一，在“名”“实”关系上执必然说。他说：“名者所以召实，凡所命名，岂漫然以呼之者乎？其呼之必有其故。”^⑪虽然他也说过物之得名“由约定俗成”，但紧接着又说：“要非适然偶会”^⑫，他的最终看法还是：“是则制名皆必有故，语言缘起，岂漫然无所由来，无由来即无此物也。”^⑬不言而喻，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妥的。第二，对“语根”一词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地方。“语根”应指语言发生之初就已产生、成为后来滋生词的总根的那些词，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根词。在实践中，面对具体的字词，要判定谁是根词，这几乎办不到。因此，研究具体字词的源流滋生关系时，应该引入“源词”这一概念。“源词”指某一滋生词所由出的词，它是否是根词我们可以不管。黄侃在判定具体字词的源流滋生关系时常说某词或某些词的“语根”是某。在这些地方，如果他的“语根”指的是根词，那么结论自然不可靠，即使他的本意只是想点出“源词”，但使用“语根”这一术语来表示也是欠科学的。当然，这只是一点不足之处，黄侃先生研究小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功垂后世。

注 释：

①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下简称《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②③④⑤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黄侃论学杂著》，第164、164、8、362、11、164、6、362、7、361—362、98、98、5、168页。

⑥⑦⑨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笔记》，第29、34、34、29、29、3、79、39、40、41、23、49、44、34—35、47、49、49、55、44、48、60、58、253、48、59页。

⑩ 陆宗达、王宁《浅论传统字源学》一文给派生词立界说曰：“派生词指由旧词分化出的新词。”见《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⑪ 徐复：《蕲春黄先生讲授说文记录》，《制言》第7期。

⑫ 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150页—156页。

⑬⑭ 《说文笺识四种》第20、59页。

⑮⑯ 黄侃：《训诂述略》，《制言》第7期。